

基于马克思社会时间理论的泛娱乐主义批判*

豆勇超

(南京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200)

[摘要]作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泛娱乐主义,其形成与发展同社会时间的演变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闲暇时间、异化时间与自由时间三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批判泛娱乐主义的时间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时间秩序。机器大工业的普及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虽为工人阶级带来了较以往更多的闲暇时间,但闲暇时间并未成为工人阶级摆脱资本剥削、实现自我发展的自由空间,反而成为滋生泛娱乐主义的时间基底。随着资本与技术的深度合谋,闲暇时间逐渐发生异化,呈现出模糊化、商品化与娱乐化的鲜明特征。资本借助信息技术与媒介平台,将娱乐渗透到日常生活场景,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生产与生活的界限,使时间成为可量化、可消费的商品。这种异化使得资本对受众的剥削从生产领域延伸至生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制造娱乐幻象,让人们在无节制的娱乐消费中丧失批判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最终实现资本奴役的泛娱乐化。消解泛娱乐主义的关键在于打破时间的资本化桎梏,将被异化的闲暇时间重新转化为真正的自由时间。唯有如此,才能让受众摆脱泛娱乐主义的景观幻象,跳出浅层娱乐的桎梏,实现精神层面的提升与自我价值的追求,最终成为完整而全面发展的人。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时间理论 泛娱乐主义 闲暇时间 异化时间 自由时间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3-0108-08

学术界有关泛娱乐主义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透析其产生、发展和寻找应对策略的,如意识形态结构^[1]、社会心理^[2]和主流意识形态^[3]等,较少有成果深入到泛娱乐主义的物质层面来对其把握。泛娱乐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观念上层建筑的问题,它还与物质问题如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等有关联;唯有深入一定社会的物质层面来寻找泛娱乐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才能真正做到把握其本质。

时间范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颇为重要的概念,马克思虽没有专门对时间范畴作出系统阐释,但有关时间的论述和思考散落于马克思的不同著作中,如劳动时间、流通时间、剩余时间、闲暇时间和自由时间等。马克思对时间的思考和运用,更多是把它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中来加以讨论,“传统社会中凝固化的时间,被资本搅动起来,变成了吸纳一切的漩涡”。^{[4](P21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通过资本逻辑对时间的规划

收稿日期:2025-06-26;修回日期:2025-07-1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智时代泛娱乐主义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与引导策略研究”(25MLD001);南京开放大学科研项目“泛娱乐主义对高校思政课的影响及其应对研究”(KYSZ202503);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资助项目(苏教师函[2025]4号);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资助项目(苏教师函[2025]4号)

作者简介:豆勇超,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来实现自身增殖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资本剥削的实质是对工人阶级时间的剥削。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时间论述的视角,从闲暇时间、异化时间和自由时间三个维度来透析泛娱乐主义,以期从社会时间维度来深化对泛娱乐主义的认知。

一、闲暇时间:泛娱乐主义产生的时间基底

闲暇时间,在马克思著作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由于马克思并未专门对闲暇时间做过系统阐发,从而引发后世在把握闲暇时间产生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为它是否从属于自由时间。如马尔库塞就明确反对把它纳入进自由时间的范畴来思考,认为它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比较流行,“‘自由’时间并非‘闲暇’时间。后者盛行于发达工业社会,但就它受商业和政治的支配而言,它是不自由的”^{[5](P43)}。鲍德里亚也指出:“不要相信关于休闲中自由的假象,‘自由’时间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只可能存在着受制约的时间。”^{[6](P172)}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判断闲暇时间是否属于自由时间的关键点在于“自由”两个字,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由于闲暇时间受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的操纵,自由时间的自由无从谈起;唯有到了生产力高度发达共产主义社会,时间不受经济以及政治等的控制并能够被个体自由的支配。事实上,马克思指出,所谓闲暇时间,就是在直接生产劳动之外所消耗的时间,它“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7](P281)}，“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8](P290)}。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闲暇时间还是自由时间,都是“非劳动时间”,马克思在使用闲暇时间更多是从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的生活处境来观照的,对工人而言,闲暇时间理所应当是比较宝贵的自由时间,它主要用来表示工人阶级的休息娱乐以及消费的时间,以保证劳动能力的再恢复。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的巨大

发展,客观上带来了工人阶级的闲暇时间的增加,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但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闲暇时间无疑成为了资本奴役工人的帮手,因为它属于消极的自由时间,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所指认的闲暇时间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唯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闲暇时间才会成为真正的自由时间。闲暇时间,不仅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有密切关联,还与其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泛娱乐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受众拥有一定的闲暇时间这一时间载体。因此,把握泛娱乐主义生发的密码,就必须要把把握闲暇时间的历史脉络。

一方面,更多的闲暇时间是泛娱乐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闲暇时间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才出现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讨论闲暇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与劳动时间是高度统一的,在封建农业社会中,受剥削者对剥削者有着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受剥削者只能在固定的生产区域进行劳作,闲暇时间与农业劳作时间是合一的。工业社会的到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对立凸显出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P405)},机器大规模的运用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升,而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使整个社会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早期的工业社会,资本家为了获取大量的剩余价值,就通过延长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来挤占其休息时间,即使有闲暇时间也被用来恢复身体以便使其更好地投入到生产中。因此,工人阶级此时根本不可能有闲暇时间,其闲暇时间被资产阶级所窃取。资产阶级不仅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也无偿占有其闲暇时间。资本生产方式的变革,特别是人类社会由蒸汽时代进入到电气时代,技术的革新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再加上工人阶级通过斗争获得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权利,客观上使得工人阶级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高效率的劳动生产,需要专注度更高的工人阶级,这就意味着资

本家必须让工人阶级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恢复劳动能力。随着工业资本社会步入鲍德里亚所言的“消费社会”，消费的功能被无限制放大，再加上工人阶级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工人阶级需要通过精神性消费来缓解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娱乐性消费所具有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嗅觉灵敏的资本把目光聚焦于娱乐市场和工人阶级的闲暇时间。

另一方面，更多的闲暇时间为泛娱乐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时间基底。泛娱乐主义是一种以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内核、以泛娱乐化为内容创作手段、以资本利益为价值趋向的意识形态。^[10]不管是享乐主义还是消费主义，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前提，两者均需要大量的闲暇时间和一定的物质前提；同样，泛娱乐主义的蔓延也离不开一定的时间载体。泛娱乐主义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个体）有了富余的劳动产品和闲暇时间。富余的劳动产品，是劳动者在排除掉自身必需的劳动产品后余下的产品，正是因为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才使个体具有了无度消费娱乐的物质基础，当劳动者还在为衣食发愁时，他们是无心于休闲娱乐的。此外，泛娱乐主义的出现是建立在受众具有一定闲暇时间的基础之上的。若如早期工业社会，资本家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是建立在延长其工作日时间之上的，那么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有闲暇时间，也更不能有时间来消费娱乐。因为资本家把眼光聚焦于一切能够给资本带来剩余价值的事物上，工人阶级的闲暇时间能给资本带来增殖，资本家肯定想方设法挤压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在这种背景下，工人阶级更不可能有自由时间来提升自己，他们更加不可能具有消费泛娱乐主义景观的娱乐能力。处于生产主义时代的资本家不可能具有消费主义时代资本家的眼界，他们不可能去培育和提升工人阶级的娱乐消费能力。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工人阶级获得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权利，资本便敏锐地盯上了工人阶级的闲暇时间。从逻辑上来看，任何娱乐活动的发生均需要一定的时间载体。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时间的缩短，受众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种时间上的充裕，为泛娱乐主义对受众的持续渗透提供了基础条件，受众没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娱乐很难形成泛化的社会现象。

二、时间异化：泛娱乐主义扩展的逻辑理路

当前关于泛娱乐主义的研究，绝大多数是把它形成发展视为观念上层建筑问题，这就容易导致对其物质关系根源的忽略。泛娱乐主义对个体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其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形塑，还体现在对个体日常生活的设计。本部分从资本与数字技术合谋引发闲暇时间的异化进而操控个体的日常生活，来探寻泛娱乐主义影响个体的物质根源。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是受众沉沦泛娱乐主义景观的物质根源，它通过与技术的“联姻”，将受众的闲暇时间转化为泛娱乐主义的“封地”。“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11](P120)}在某种意义上，时间成为支配一切文化形态的权力。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资本就把时间权力吸纳进自身，使时间按照自身逻辑来布展，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两者的时间均受资本的支配。一方面，资本为了使自身不断增值，使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等以“加速”的形式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被资本控制的时间，为了使资本不断增殖，则对工人进行全方位的控制。^[12]以大数据、物联网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人类社会步入了数字化时代，也就是罗萨所言的“加速社会”^{[13](P28)}。科学技术的进步本应该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的闲暇时间，但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合谋，模糊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劳动时间与休息时间，使劳动者无法真正享有闲暇时间，反而将泛娱乐主义包装为个体本应如此的生活方式，把个体的闲暇时间视为资本增殖的“围

猎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泛娱乐主义，正是借助闲暇时间的模糊化、商品化和娱乐化，来建构一种满足资本逻辑运转的生活方式，并把它融入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

其一，闲暇时间模糊化。闲暇时间模糊化，指的是在数字化时代闲暇时间与劳动时间的界限正在消失。工业资本社会下，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相对立而存在，人们在劳动中不会有自由感。付出劳动时间的受众不仅没因劳动而获取幸福，反而在劳动中成为“单向度的人”。

工人阶级围绕着劳动时间同资本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早期的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时间到后来的八小时工作制，则表明了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博弈。因此，工业资本社会下，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工作）与闲暇时间（生活）的界限是一目了然的。芒福德曾明确指出工业时代的核心就在于时间，“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14](P15)}。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会越过劳动时间进入到闲暇时间。一方面，伴随互联网以及智能媒介的广泛应用，个体劳动将不受时空限制，致使原本属于个体的闲暇时间被劳动时间所侵蚀；另一方面，劳动时间也常被即时通讯以及社交媒介等非工作活动所干扰，从而使受众的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界限不再明晰。闲暇时间模糊化，不仅更改了受众的时间分配，还对受众的心理健康、生活节奏以及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原来的时间结构被数字技术瓦解和重新建构。首先，劳动时间分散化。马克思的“工作日”范畴揭示了工人阶级在固定的场所、固定的时间内工作，很好地诠释了工人阶级劳动的时间空间同步化。数字时代使劳动形态由过去的雇佣劳动转化为数字劳动，数字劳动者制造的非物质性数据打破了时空的制约，使其成为没有固定的时间和没有固定的空间的“指尖生产者”。其次，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界限模糊化。对于工业资本家来说，资本增殖的方式就是最大限度的压榨劳动时间；对于数字资本家而言，资本增殖的方

式在于工人阶级的闲暇时间，惟有使闲暇时间消费化，才符合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不断增殖的目的。闲暇时间成为劳动时间的补充，以此来满足资本逻辑在消费社会不断增殖的循环机制，这样闲暇时间和劳动时间的界限就模糊化了。因此，对于数字资本来说，劳动者没有所谓的闲暇时间，只要他们在线，不管是网购还是娱乐就会留下痕迹，劳动时间往往是以娱乐时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其二，闲暇时间商品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曾指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象征，它的生产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15](P47)}数字资本在掌控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要想获取价值形式，就必须推动闲暇时间的商品化。詹姆斯·富尔彻认为，“闲暇正是通过商品化的过程成为资本主义创造的产物”^{[16](P8)}。首先，劳动者占有商品是闲暇时间产生的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揭示的商品拜物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商品以物的形式所遮蔽，从而导致社会以颠倒的形式来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谁占有的商品越多，就意味着谁的人生就越成功，这种拜物的价值观当然是不正确的；但个体若没有占有商品的本领，则意味着他不可能拥有美好生活，也意味着个体没有闲暇时间。因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的基本需求以及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都高度依赖于通过购买商品来实现。不占有足够的商品，个体不仅无法获得维持生命的物质资料，更难以参与到社会交往和文化活动中，而这些活动恰恰是闲暇时间得以展开的重要场域。其次，闲暇时间被数字资本视为一种商品。数字资本时代，个体的活动往往是和数据关联在一起，个体是数字的生产者，数字资本利用智能算法来分析个体数据，根据个体的偏好有针对性地推送给个体。闲暇时间表面上看是按个体的意愿来展开娱乐消费活动，实际上个体的娱乐消费活动早已被数字资本所掌控。当受众无法在现实中从工作和生活中获取自身的价

值,数字虚拟空间所建构的各种消费平台便成为其获取自身价值的“良好”场所。数字资本通过短视频等方式将人生的意义和生活方式均定位于金钱、高消费和娱乐活动上,从而使个体滋生符号式的伪需求,它将个体的闲暇时间裹挟到商品的生产消费机制中,使受众聚焦于商品的社会意义,追求身份的区分。一旦个体沉浸于数字资本编织的娱乐消费狂欢中,个体的闲暇时间就会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娱乐消费时间,与此同时,个体也会被数字资本所建构的泛娱乐主义、消费主义等错误价值观所支配和形塑。这样,闲暇时间在个体那里就成为了一种商品,个体以商品买卖的形式来获取闲暇时光。

其三,闲暇时间娱乐化。在马克思看来,娱乐应与人的本质关联在一起来把握,它可以展现人的丰富性和个性,分为消遣方面的愉悦和审美方面的愉悦,是人成为完整的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的休闲娱乐离不开受众有更多的闲暇时间。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17](P199)}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科技进步确实给劳动者带来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但与此同时,资本逻辑又悄无声息地把劳动者的闲暇时间转化为免费的劳动时间。这里无疑体现了马克思运用革命的辩证法揭示的资本二律背反的特性,对于资本必须要加以限制利用,不能让其“横冲直撞”。资本逻辑增殖的本性,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不管是在闲暇时间进行的消遣娱乐,还是在自由时间进行的审美娱乐,娱乐时间均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资本鼓吹“娱乐至死”,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以商品化的形式涌现,刺激新颖的短视频、轰动新奇的娱乐八卦以及精准投喂的网络消费等等,受众的闲暇时间娱乐化成为资本获取流量密码的牟利形式。休闲娱乐既是个体生存发展的活动方式,也成为了智能时代资本增殖的重要手段。资本逻辑诱使受众加入娱乐大军以此来保证资本的不断增殖,使受众的闲暇时间成为一个纯粹

的娱乐过程。没有闲暇时间就无所谓对闲暇时间的剥削,当受众把娱乐当作闲暇时,当闲暇惟有娱乐才使受众得以慰藉时,这样所获得的闲暇时间不过是资本主义为受众所编织的数字化美好生活的虚假幻象。受众在闲暇时间中长期沉迷于泛娱乐化景观中,就会导致其精神价值出现,“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从我们手边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18](P8)}。闲暇时间的利用就会转变为无意义的消遣虚度,受众在对感官刺激的泛娱乐化景观追逐中丝毫感触不到时间的消逝,沉迷于娱乐的狂欢中而不能自拔。

三、自由时间:消解娱乐主义的实践进路

从马克思的相关文本中可以发现,只要受众的闲暇时间隶属于资本逻辑,那么受众就不可能从泛娱乐主义的藩篱中脱离出来。惟有受众从闲暇时间摆脱出来,才能真正摆脱泛娱乐主义的支配和控制。要使受众从闲暇时间脱离出来,需要具备两个方面条件:一是客观条件,即变革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使闲暇时间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只有通过变革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人,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被资本所裹挟的状况,让时间回归其本真的属人性,为自由时间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二是主观条件,即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使受众进入自由时间状态。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泛娱乐主义以其强烈的感官刺激和即时的快感满足,很容易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个体需要主动培养辨别信息真伪、判断内容价值的的能力,不被娱乐化的表象所迷惑。通过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逐渐摆脱对泛娱乐化内容的依赖,从而在主观上具备进入自由时间状态的能力,将时间用于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的精神满足。

自由时间在马克思文本中主要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下的，一个是共产主义社会下的。对于前者而言，这种自由时间只能是对资产阶级而言的，因为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其自由时间必然被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无偿占有，他们所生产出来的剩余劳动产品，不仅为资产阶级创造出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还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自由时间，其自由时间正是通过占有和挤压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得来的。对于后者而言，自由时间指的是个体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个体用来提升、发展和完善自我的时间，主要涵盖了“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15](P306)}。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两者的关系。一般来说，闲暇时间，指的是在劳动时间之外个体进行娱乐休息的时间，如看电影、打游戏等，其积极作用在于通过休闲娱乐以便更好地投入到劳动工作中；它在私有制社会中会受到限制，而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者却可以肆意挥霍。而自由时间则是保障未来社会每一个个体能够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一条件下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合为一体，它与那些无所事事、低级趣味的娱乐丝毫不相干。一般来说，闲暇时间出现在到现在为止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它的长短与所处社会的生产关系成正相关；而自由时间是人类到了共产主义之后保障每一个体得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

从以上有关时间的论述，可以得知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显著标识。工人阶级一旦拥有了自由时间，就表示他们不再受资本的支配和压榨，也意味着他们不再受泛娱乐主义的控制。第一，自由时间将取代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象征。泛娱乐主义借助商品也就是物品来扩大影响进而提升自身的吸引力，它本质上是借助商品来诠释人的价值。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

其手稿中所揭示的商品拜物教，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和驱使自身，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实际上就是资本。资本逐利中的“利”就是价值，就是劳动者在剩余时间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衡量剩余价值的标准就是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劳动时间，这样劳动时间在资产阶级社会成为了社会财富的象征，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者就在于他们在不断榨取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尤其是剩余劳动时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自由时间就等于财富本身。^{[19](P230)}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两者合一，每一个体都将把追求自由时间作为自我目标。第二，自由时间将消解异化时间建构真实的娱乐需求。作为成为完整的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娱乐可以呈现人的丰富性和特殊性。抵制泛娱乐主义，并不是要抵制娱乐本身，而是要抵制泛娱乐主义所推崇的异化娱乐。在自由时间状态下，娱乐成为个体提升自我和发展自我的重要途径。休闲娱乐与发展生产两者并不是南辕北辙的关系，发展生产，既隐含着发展休闲娱乐的资料，也隐含着发展休闲娱乐的能力。在自由时间状态下，娱乐的目的就是个体自我本身，是个体提升和发展自我能力的方式，娱乐与社会生产呈正相关。第三，自由时间成为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空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0](P532)}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个体的肉身虽受时间的制约，但可以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进行创造性活动，进而延伸肉身的存在时间和提升自身的人生价值。^[12]马克思曾指出，节约劳动时间就是“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21](P107-108)}，自由时间的增加可以使个体结合自己的兴趣来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从而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进而拓展人类社会发展的空间。

个体要实现自由时间，就需要从泛娱乐主义的支配中脱离出来，消解异化时间带来的异化娱乐，具体需要从以下几点来努力。

其一，大力发展生产力。物质生产是人类存

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自由时间实现的现实基础。若个体连基本生存条件都不能得以保障,闲暇生活和自由时间也就无从谈起。随着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社会必将会出现生产力提升和工人阶级劳动时间降低,从而使工人阶级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在资产阶级私有制社会中所获得的闲暇时间,并不能使工人阶级获取真正的自由时间,因为工人阶级获取的闲暇时间是以高度紧张的工作为前提的,是为让工人阶级更好地投入到下次劳动中。工人阶级要获取自由时间,就需要生产力高度发达达到工人阶级用于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在下降,而用于个体自由发展的时间在增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17](P200)}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仅没有给受众带来自由时间的增加,反而加剧了对自由时间的剥削和压榨。依靠技术进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根本无力解决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面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P592)}这样,惟有变革生产关系,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使受众获得真正的自由时间。

其二,变革生产关系。大力发生生产力所解放的自由时间,只不过是可能的自由时间,要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变革生产关系。资本私有制所建构的现代雇佣劳动关系所造就的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分离,劳动者在异化劳动中生产出不事劳动却对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占有的资产阶级,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本质上还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因此,自由时间的真正实现,必须从根本上变革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22](P278)},当资本发展到极致必然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

代替”^{[9](P575-576)},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可以打破狭隘资本雇佣劳动的私有制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共产主义中,生产资料采取公有制形式,每一个体均需要进行劳动,劳动越平均化,每一个体越能获得自由时间。“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大。”^{[23](P605)}这样,公有制确保了受众在自由劳动中达到了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共同发展,从而使自身获得全面性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24](P69)}。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之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要求具有极大的物质财富,从而在经济上保障受众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多的自由时间;另一方面,要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极大富有,在精神上满足受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中增强受众的精神力量,从而达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三,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发展生产和变革关系,使劳动者从支配和控制中解放出来,当他们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时就不会再感受到不自由,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在闲暇时间中寻求娱乐以图在异化时间中来获取“自由”。第一,深化对自由时间的认知。当劳动者从异化劳动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后,劳动者需要通过学习和培训,深化对自由时间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知晓自由时间对自身的积极意义,并把其作为自身的生活目标来追求。第二,树立正确的娱乐观。休闲娱乐不等于享乐主义,娱乐理应对时间的合理设计,从而使受众获取真正的休整和发展。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来指引休闲娱乐,在获取一定自由时间的前提下,需要把闲暇时间转化为自由时间,把更多的自由时间运用于个体的创造活动中。第三,强化自身获取自由时间的能力。自由时间,绝不是一种随着社会进步个体就能够达到的状态,除了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还需要个体发挥主体

能动性,提升自身获取自由时间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豆勇超. 基于意识形态结构理论的泛娱乐主义透析[J]. 北京社会科学, 2021(9): 66-75.
- [2]邢国忠, 张敏. 泛娱乐主义的社会心理分析及其应对[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5): 106-111
- [3]李明, 汪青. 网络泛娱乐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及其应对[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10): 86-92.
- [4]仰海峰. 《资本论》的哲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5][美]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6][法]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第3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0]于钦明, 王启帆. 泛娱乐主义的算法审视与纠治[J]. 江汉论坛, 2024(7): 79-84.
- [11]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12]付文军. 《资本论》中的时间概念及其社会历史向度[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5): 73-80.

- [13]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或,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14]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 陈允明, 等,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16]FULCHER J. Capit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U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8]西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 顾仁明,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责任编辑 史敏】

Criticism of Pan-Entertainmentism Based on Marx's Social Time Theory

DOU Yongchao

Abstract: As a trend contrary to mainstream ide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pan-entertainmentism is closely bound up with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time. Leisure time, alienated time and free time are intertwined, jointly forming the temporal logic for criticizing pan-entertainmentism.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have disrupted the time order of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popularization of large scale machine industry has greatly raised production efficiency. Although bringing workers more leisure time, it has not freed them from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instead becoming the temporal basis for the breeding of pan-entertainmentism. With the deep collusion betwee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leisure time has gradually become alienated, showing distinct features of blurriness, commodification and entertainmentization. Via media platforms, capital infiltrates entertainment into daily life,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work and leisure, turning time into quantifiable and consumable commodities. This alienation extends capital's exploitation of the audience from the sphere of production to every corner of daily life. By creating illusions of entertainment, capital makes people lose critical awareness and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in unrestrained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ultimately resulting in capital's pan-entertainment domination over people. The key to dispelling pan-entertainmentism lies in breaking the capitalist shackles of time and converting alienated leisure time back into real free time.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public break away from the spectacles of pan-entertainmentism, pursuing spiritual improvement and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x's Social Time Theory; pan-entertainmentism; leisure time; alienation time; free time